

##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李沛利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2370)

**摘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她以特定的社会环境为背景, 塑造了纷繁驳杂的女性角色, 讲述了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故事背后是张爱玲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她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 展现了新旧交替时代女性悲惨的现实生存状态。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悲剧; 情感和欲望;

**中图分类号:** I21 I206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以女性为写作题材的作家有很多, 但是很少有人能如张爱玲一般用犀利的目光, 尖锐的笔触撕开那层被欲望所异化, 覆盖在亲情与爱情上的面纱。很多人认为张爱玲不过是一个写爱情故事的作家, 但深入研读其作品后, 我们不难发觉张爱玲小说的意蕴绝不仅仅停留在爱情的层面, 她擅长以敏锐的目光直击社会的阴暗面, 用细腻的文笔将人性世界的黑暗层层剥开,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张爱玲不仅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 同时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女性意识也有着深刻的思考。本文主要针对张爱玲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揭露当代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文中所蕴含的张爱玲对于人生和女性精神的思考和感悟, 有助于引导现代女性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思考, 深入认识女性悲剧的根源, 把握幸福人生。

### 一、 张爱玲与她的小说

张爱玲生于贵族家庭, 祖父母声名显赫, 但随着清朝的腐败和终结, 家族也逐渐破败没落。她从小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 父母婚姻的不和, 母爱的缺失, 家庭经济败落的寒酸等等使得她心灵敏感、内心孤独, 她一直在父亲、继母、姨太太的夹缝中生存。家庭对于她而言, 毫无温馨, 只有“古墓的清凉”。她笔下的父母多是不称职的: 《金锁记》中曹七巧一生得不到幸福, 便要儿女陪着自己一同堕落, 生生拆散儿女的婚姻;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母亲, 面对儿子儿媳对女儿的排挤, 只有漠视。当白流苏向她哭诉时, 也只是一笑了之的态度。张爱玲对这种亲情关系的描写, 既体现了自身家庭对她的深重影响, 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后来个人婚恋的失败更使她看清了婚姻的脆弱。父母的离异和自己婚姻的不幸使她对于爱情产生了一种悲观消极的心理, 所以她笔下的婚姻故事大多是现实的, 具有悲剧色彩的<sup>[1] (p66)</sup>。

张爱玲的小说与她的人生阅历不可分割, 可以说丰富的人生阅历恰恰是她创造的源泉。

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S 艾略特）曾说过：“一个诗人一生的抗争就在于将它深受的个人的痛苦，转换成丰富和奇特的属于全人类的而非个人的痛苦。”张爱玲便是如此。她的作品蕴含着她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不同人生阶段的映射，也体现了她的成长和改变。因此，虽然她的作品多以婚恋爱情故事为题材，但贯穿作品的情感基调往往是悲凉的，在叙述中也多远离浪漫主义的色彩。

## 二、 张爱玲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分析

张爱玲的姑姑曾说：“张爱玲的身上有一根俗骨。”这句话便道出了张爱玲写作的内在追求。她注重生活的日常性和世俗性的描写，故事中人们的想法与行动更多是出于现实、物质或经济的考量。张爱玲虽塑造了纷繁驳杂、个性鲜明的女性角色，她们成长经历不同，性格不同，但最终的人生结局却大多都以悲凉告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新旧思想激烈交锋，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开放进步的西洋文化猛烈冲击着这个社会。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女性，无论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亦或是生存在传统封建落后思想熏陶下的女性，都面临着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立足的困境。面对生存的危机，她们最终选择依靠于男人，借助一段功利型的婚姻来摆脱既定的命运。婚姻爱情于她们而言不过是一场交易罢了，通过出卖身体和灵魂来换取富足的物质和生存的保障。她们或主动，或被动的在物质和婚姻的双重束缚中不断堕落<sup>[2] (p47)</sup>。我认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 （一）物化婚姻的牺牲品

《金锁记》是张爱玲受到最高评价的作品之一，小说一经发表就被著名翻译家傅雷称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小说成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曹七巧这一性格极端的女性形象，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为了金钱，从人蜕变成魔鬼，最终被金钱禁锢了一生的悲惨故事。

曹七巧是可怜的，她完全是物化婚姻的牺牲品。出嫁之前的她，有着一一种纯朴健康的泼辣美，生活简单却又快乐：“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彼时的她从未想过婚姻会成为她人生转折甚至于导致下半生悲剧的关键。她的兄长因贪图钱财将她嫁给了姜府，与自从生下来便卧病在床、患骨痲病的二少爷成婚。然而家庭地位的悬殊和健康状况的差距使得她在婚姻中完全没有主动权和选择权，她在这个封建家庭中毫无地位可言，处处受人轻视，就连丫鬟、仆人都敢背后议论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婚姻虽为她提供了一张长久牢固的饭票，但她却失去了青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段婚姻中，她得不到任何身体和精神的慰藉，只有来自封建大家庭不断地压抑。情感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使得她抓狂。在长久的压抑下，她内心的愤恨无处发泄，于是

企图通过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发泄内心的愤恨，常常当众使人下不来台。同时内心也日益扭曲：在分家后她将金钱视为唯一的解脱，认为只有金钱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为了守护财产，她赶走了那位贪图金钱因而想与她重叙旧情的三少爷季泽，拒绝了心仪对象的试好，她自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失去了对爱所有的期盼，她的世界里只有金钱。在这段物质化的婚姻中，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牺牲品。从一开始被迫卷入这场婚姻交易，直至最后在金钱的诱惑下，人性逐渐被腐蚀掉，人生被彻底摧毁，她从一个青春、富有活力的女子沦为了恶毒变态的刻薄妇人。纵然临死之前似乎她也有过短暂的后悔，回忆起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日子不禁落了泪，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了。

然而，曹七巧虽然是物化婚姻的牺牲品，是一个可悲的受害者，同时却又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她破坏一切，自己婚姻的不幸使得她内心扭曲，见不得别人幸福，连亲生子女也不放过。她用鸦片和流言瓦解儿子的家庭，蛮横逼死了儿媳，还有意拆散大龄女儿的最后一次结婚机会，最终使得儿女的婚姻都如同自己般不幸才罢休。曹七巧的阴暗、扭曲、自虐进而虐待亲生子女的行为令人后怕，作为一个被金钱异化了的女性，她虽然得到了金钱，但却失去了所有<sup>[3] (p103)</sup>。

对于曹七巧，无论是最初的受害者，还是之后的加害者，究其根本都源于那桩丑陋的婚姻交易，她完全是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不幸与自身性格的扭曲密切相关，但是深究其根源，社会因素才是根本。张爱玲通过曹七巧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将一位女性如何从受害者沦为加害者的心理变化过程给予了细致地描绘，将一个出身于平凡小市民阶层的女性在封建男权社会的现实生存状态真实地展现了出来，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势力和欲望的羁绊对人性的摧残，尤其是对于女性的迫害。

## （二）物化婚姻的算计者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一类型的女性有很多，她们的婚姻是被物质化了的。在她们看来，婚姻和爱情是分割的，她们不是为了爱而结婚，而是为了婚姻所能提供的物质财富和生存保障而选择了婚姻。

《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二人虽有爱情，但究其本质，亦是一场关于金钱与色相的交易。出身没落贵族大家庭的白流苏，是个具有不彻底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面对首段不幸的婚姻，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与丈夫离婚。然而回到白公馆后，面对兄嫂的冷嘲热讽和母亲的漠视态度，她无法在家中立足，看透世态炎凉的她只好寻求新的出路。偶然的的机会白流苏认识了放荡不羁的华侨富商范柳原，于是便决心用所谓的婚姻为自己赢取一份经济保障。二人在这段关系中怀着不同的目的，却都期望在感情上向己方倾斜。范柳原只想保持一种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而白流苏却将婚姻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二人不

断斗智斗勇，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恰合时宜地促进了二人感情的飞跃，他们共同经历了炼狱般的人生，在生与死的考验下他们终于结成了有婚姻束缚的夫妻关系，白流苏成功登上了范太太的宝座。

小说通过对白流苏物化婚姻观的描写，与题目《倾城之恋》所蕴含的“倾城倾国”的美好爱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讽刺，加深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色彩。但是，无论是曹七巧，还是白流苏，她们的想法和行动皆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或者经济的考量所做出的无奈选择。白流苏作为一个受过西洋文化洗礼的现代女性，她既保守又开放。她的身上体现了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佐证。她说：“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于是她反抗丈夫的家暴行为，与包办婚姻作斗争，勇敢面对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离异的流言蜚语，不屈服于不公的命运<sup>[4] (p231)</sup>。

但在那个被封建宗法势力笼罩奴役的年代，白流苏的斗争注定是失败的。她无法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真正实现自我的主宰，因此只能选择听从命运。作为物化婚姻的追逐者，白流苏的婚姻观早已扭曲，爱情是她换取人生安稳的工具。她清醒地明白自己的目的和追求，最终她赌赢了，但与此同时，当初那个不考虑世俗观念，勇敢、清醒、独立的白流苏却不在了。在这份畸形的爱情观下，结果不论输赢都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张爱玲在剖析讽刺物质化的婚姻观的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意识最深处中守旧、落后的一面。女性永远是男性世界的附庸这样一种男权文化思想将深深禁锢在以白流苏为代表的女性身上。

### （三）自甘堕落的毁灭者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薇龙在香港读书时投奔姑妈，而作为交际花的姑妈梁太太对于葛薇龙的到来却别有用意。她希望通过收留青春貌美的葛薇龙来吸引自己喜欢的男人。薇龙渐渐明白了姑妈的用意，但是在豪华生活的诱惑下，她沉陷在这种环境中无法自拔：“薇龙住在了姑妈家，房间里有许多衣服，她一件一件地试。”她没有抵挡住姑妈家豪华生活的诱惑。“柔滑的绸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这句话将一位女学生禁不住诱惑的心态写得准确、生动。葛薇龙就这样在物质和情欲中不断地堕落，即使后来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却也不断安慰自己：“这样看看也是好的。”终于在现实生活的各种诱惑下，她成为了第二个梁太太。后来她爱上了乔琪，在畸形的爱情面前，葛薇龙说：“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二人结婚后，葛薇龙的生活跌入了无边深渊，她彻底成为了乔琪和梁太太的赚钱工具。“从此，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日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即便她对于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地认识，“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但她为了金钱和那份本就畸形的爱情选择自甘堕落，彻底毁灭了自己的人生。在葛薇龙身上体现了女性意识逐渐觉

醒的过程。然而虽然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她自省、自察，可最终自己的选择使得她仍难以逃脱悲凉的结局。

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小说中，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她们不是英雄，她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因为她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她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sup>[3]</sup>。”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却都被金钱和情感紧紧地束缚着。她们主动或者被动的经历着各种不幸，选择以牺牲婚姻爱情为代价换取物质生活的稳定。曹七巧用婚姻、幸福作为条件换来黄金枷锁，最终彻底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恶毒妇人”，害人又害己；白流苏拿着残存的青春做赌注，换来与范柳原的一纸婚书，成功赢得了所谓的“长期饭票”；葛薇龙在金钱的诱惑下自甘堕落，最终成为了第二个梁太太……这些女性形象是复杂的，她们用自己的故事丰富了张爱玲小说的内涵和层次。

### 三、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的小说注重追求生活的日常性，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对于爱情和情感的理解也更趋于现实和日常，所做出的行动和选择与特定的现实环境和物质需要不可分割，她们完完全全是特定时代背景所造就的产物。因此，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不能仅凭借她们的选择和行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人物进行单一的评判，而应深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立足于历史深处进一步考察分析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我认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一）主观原因：女性自身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悲剧的结局，往往是由于悲剧主人公自己的过失造成的。”张爱玲笔下的她们，也曾有过美丽的梦想；也曾向往过爱情；也曾想过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发光发亮；甚至即使面对生活的不公，也努力进行过抗争……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在一身的棱角被现实狠狠地打磨后，她们仍旧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

#### 1. 情感和欲望的羁绊

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魔都，有着形形色色不同阶级的人。他们有的身份尊贵，手握重权；有的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温饱不断地与生活进行抗争<sup>[5] (p11)</sup>。[5] (11)对于那些始终无法摆脱生存困境的女性来说，贫富差距的强烈对比和女性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得她们萌发了对金钱无限的渴望。金钱对她们而言变成了一个执拗的信念，为了谋求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即便是要伤害自己的亲人，即便要违背伦理道德，即便要用自己的肉体 and 婚姻作为代价，她们也愿意去赌：葛薇龙在物质和情欲中自甘堕落，沉醉在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白流苏、曹七巧等人更是因为对金钱的迷恋，被紧紧地困在欲望的迷宫里；霓喜通过牺牲肉体来换取男人赐予的物质利益；敦凤为了谋求权利和金钱，将自己嫁给了米先生，还自嘲说自己

就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可是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何其无趣，也许只有多年后她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吧。在这种物化婚姻观的影响下，她们的内心早已扭曲。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深深地领略到了在欲望面前人性的不堪一击。

## 2. 自身性格的缺陷

对于女性自身性格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性格的软弱与妥协。[5] (12) 鲁迅曾说：“正是由于女性自身的不彻底——她们反抗的不彻底，出走的不彻底，所以命运只能如此，只能充满悲剧色彩。”她们随波逐流。即使有些人接触过新思想，新文化，但是在浓重的封建思想的笼罩下，她们既不敢与该死的封建礼教拼死一搏，又不敢彻底地反抗命运的不公，最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她们表现出软弱、依附，自身的性格缺陷导致了她们悲剧命运的结局。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曾激烈地与包办婚姻作斗争，面对丈夫的家暴行为，毅然决然选择离婚。她曾勇敢面对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离异的流言蜚语，与封建社会有过激烈地斗争，但最终迫于压力和无奈，选择了妥协。故事的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仍旧充满了悲哀与无奈。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也是懦弱的。顾曼桢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有自己的工作，有过幸福的爱情，但是在爱情方面，她始终不敢向前迈步。她担心家庭的重担会拖累世钧，担心世钧的家庭会嫌弃自己有个做舞女的姐姐，甚至面对世钧的主动，她仍然在退缩。在被姐姐伤害后，她更是觉得配不上世钧。最后为了拯救自己生下的姐姐的孩子，她做出了妥协，选择了祝鸿才，使自己彻底陷入了无边的痛苦。

《红玫瑰与白玫瑰》孟烟邈为了守住看似安稳的人生，保住婚姻和名分，忍受着丈夫对他的挑剔和讥讽，甚至对丈夫外面找女人鬼混的行为选择漠视。在这段感情中，她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选择。虽然收住了婚姻，但却失去了自我。

### (二) 社会原因：封建宗法思想的深远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便强调“男尊女卑”、“门当户对”等观念，女性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论是家境富庶，还是生活困窘，都无法支配自己的婚姻。婚姻爱情更多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往往是种种利益权衡后的结合。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注定从一开始便不会幸福，这也是导致女性悲剧的主要原因。《金锁记》曹七巧的婚姻便是由兄长的一笔交易所定下的。被金钱换来的婚姻使得七巧的一生被金钱紧紧的束缚着，在家庭的压抑之中走向了疯狂和毁灭。

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不仅无法支配自己的婚姻，同时也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难以立身于社会的女性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为了生存和立足，在人格和心理上只能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依附于男性，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因此，无论是对于接受封建思想熏陶的女性，或者接受过西方进步思想洗礼的女性来说，在现实残酷的逼迫下，

一段无关乎爱情，充满物质化的婚姻看似便是摆脱生存困境的一个不错选择。《半生缘》的女主人公顾曼璐面对父亲的早逝和家道中落，为了维持生计，作为长女，她主动担起了重任，抛弃爱情，做了一个舞女，从此以色侍人，养活家人。嫁给祝鸿才后，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使她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对于一个受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的家庭而言，妻子丧失了生育能力，大多便意味着婚姻的终结，更何况本就是一段因利益而形成的婚姻。为了避免婚姻破裂，亦或说是为了留住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饭票”，她想到了借腹生子，而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顾曼桢。此时的她已丧失了理智，毫无人性可言，曾经忠厚、善良的顾曼璐不见了。她逼迫曼桢与祝鸿才生下了孩子，亲手拆散了曼桢的爱情，摧毁了妹妹的一生，二人的姐妹之情也彻底走向了终点，最终顾曼璐在自责和绝望中死去了。这是一段多么讽刺的亲情和爱情，从她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宗法思想对女性的思想的毒害和人生的毁灭之深重<sup>[6] (p87)</sup>。

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这样一个思想进步，观念开放的年代，社会中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仍保留着些许残留。一些家庭中，甚至一些女生的自我认知里，仍认为女性一生的归宿即结婚生子，她们将寻求一段稳定的婚姻或者一个可靠的结婚对象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期待着麻雀变凤凰的机遇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不难想象，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她们所做的选择是何其无奈。

#### 四、 总结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角色众多，性格鲜明，虽然她们的经历有些许差异，但最后的人生结局大多是悲凉的。她们的身上都体现了一个共性——金钱对于人性的腐蚀。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出发，精确地抓住了人性的阴暗面，将主人公们的心路变化历程及她们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生动地刻画出来，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尖锐地讽刺和无情地披露，鲜明地表达了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女性意识<sup>[7] (p118)</sup>。

在《谈女人》一书中，张爱玲谈到对女性处境的认识：“女性之所以处于社会弱势，不能单怪别人和时代。真正的女性精神不是重复女性所受迫害的处境，而要深刻认识到女性自身的问题。”张爱玲的小说写出了女性问题中更为复杂的一面：她不仅看到了女性生活的悲惨，同时关注到了女性问题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既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女性悲剧的根源，也有利于现代女性对于今后的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培养给予更多的关注。正如《金锁记》中所讲的那样：“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如今我们读着张爱玲的故事，品味着书中的爱恨情仇，却也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我们看似在扮演着看客的角色，但也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其中的感染。张爱玲笔下所蕴含的她对于女性人生的思考与感悟在不断影响

着我们，指引我们去选择未来发展的道路。在 21 世纪这个思想开放，进步，文明的社会中，女性要怎样实现人生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1] 戴玉. 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扭曲[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7(1):65-66.
- [2] 李炎超. 凄清苍凉的人生——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17(9):45-47.
- [3] 李寅然.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 语文学刊, 2010(12):103-104
- [4] 姚昌美. 张爱玲小说中的几种女性形象剖析[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1):230-231
- [5] 王亚丽.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浅议[J]. 青年时代, 2019(2):11-12
- [6] 王朝彦. 读张爱玲的《十八春》及《半生缘》[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21(3):86-89.
- [7] 何宗龙.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研究 II.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13(01):118-119.

## An Analysis of Female Image in Zhang Ai-ling's Novles

Peili Li

(Zhengzhou / HeNan,452370)

**Abstract:** Zhang Ailing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specific social environment a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she created numerous complicated female characters, and told us many sad but beautiful love stories. Behind the story is zhang ailing's complaint against the feudal society. She has revealed the bondage and oppression of women in the feudal society, and has shawn the miserable living conditions of women which liv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ovle's of Zhang Ai-ling; Female tragedy; Emotions and desires